

不止于凝望，不止于赞叹

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诗人走进故宫博物院

□本报记者 罗建森 张昊月

紫垣千载立嵯峨，金瓦飞檐映日华。9月20日，参加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的中外诗人们来到故宫博物院，漫步在这座历史和文化的殿堂之中，触摸时光痕迹，聆听历史回响，开启又一场跨越时空与文明的对话。

位于北京中轴线的故宫博物院，是我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它是中华文明的一扇窗口，传递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典雅气度。

进入太和门，乌拉圭诗人丽格娜·拉莫斯被眼前气势恢宏的建筑吸引，兴奋地四处眺望，忍不住赞叹道：“太神奇了！我从未想过能看到如此美丽迷人的建筑！很难想象当年的能工巧匠经过怎样的智慧设计和精心构建，才有了这巍峨庄严的一座座殿堂。”她放慢脚步，细细端详高处的飞檐斗拱和屋脊上的各种神兽，不断向翻译追问它们的名称，了解它们有什么吉祥寓意。

太和殿广场面上的方砖历经雨打风吹，已变得不甚平整，留下沧桑岁月的痕迹。在墨西哥诗人马努埃尔·夸乌特勒看来，这些凹凸不平的砖块如同从地表生长出的诗歌，传递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好像大地唱给今天的古老歌谣。富有层次的红墙金瓦、蓝天白云，又像一幅幅流动的图画，沉厚而热烈。漫步在三大殿边的甬道上，他笑着说，当年一定有不少忙碌的身影在这里奔走，展现出东方特有的传奇气息。“我的家乡也有类似的历史悠久的建筑，人们常常在那里寻找往昔的荣光。在我心里，两个遥远国度的历史一样灿烂，一样充满诗意。”

古巴诗人吉赛尔·露西亚·纳瓦罗曾经多次梦想来中国，这次活动是她的圆梦之行。在故宫御花园，她看到一株遒劲的老树，走到树边仔细观察树干和树叶。这是她从未见过的一种树，她很好奇这棵树的树龄是否像故宫一样长久。“故宫弥漫着浓郁的文化之美和花草之趣，在这里，它们都很和谐。我一定会把故宫的美写到自己的诗歌里，将今天的游踪永远记录在诗行里，让它们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短短几天的中国之行让诗人们收获颇丰，他们对中国古老的文明赞叹不已。对于每个参加活动的诗人来说，此次诗会都是一份珍贵的馈赠。不少诗人表示，他们已经在行程的间歇写下多首和中国有关的诗，来表达自己丰盈的感受，此次诗会为他们搭建了一个更好地用诗歌实现对话的平台。

参观结束，来自15个拉美国家的诗人们还在兴致勃勃交流故宫之行的感受。这里是诗会的最后一站，绿树红墙、秋风丽日，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留下了美妙的诗韵。一周时间内，中外诗人们以诗歌为纽带，共话友谊，畅想未来。诗会虽然落下帷幕，但彼此间诗歌文化交流的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AI时代，如何守护与激发文化原创力

□王一川

活。AI可以按照人类的意图，实现很多东西。它可以复制，可以批量生产，有效降低成本，体现创造力，甚至它的智商还会越来越高，进化得越来越好。任何一种工具，都可以带来新的文化和艺术的可能性。就像媒介学家麦克卢汉说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是人类能力的拓展。这就是说，使用一种新媒介，就可能带来一种新的文明。五四时期的报刊，极大地提升了新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效能。当时的每一份《新青年》杂志，都代表了革命的火焰在燃烧，激荡起了很多年轻人向往革命的斗志。到了现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提升了人们进行文艺创作与传播的速度，更新了文艺的新生态。所以，媒介技术不只是工具，它还可以引领、协助人们开创新的文化空间。

具体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创作，我们实际上无法逃避AI。在生活中，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在养老院协助老人做很多事情，或者在医院里做手术。在创作中，很多基础的工作，比如查阅资料等等，完全可以交由越来越普及、成本也越来越低的AI来完成。在这些工作中，机器人有时候比人类做得还好。为什么不用呢？还是要用。我相信，AI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就像导航地图，起初也不大准。但是现在，我们出行可以完全信赖它。在将来，AI的发展也会不断趋近这样的状态。

第二个问题：就目前的状态而言，AI完全可以取代我们吗？我们完全只依靠它，行吗？

我今年接到一个约稿，写《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的影评。我出于好奇心，就向AI输入指令：“请运用王一川的书籍和论文中的观点，写一篇《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的影评，字数5000左右。”很快，稿子就出来了。它还真的阅读了我前不久发的文章，比如《艺术批评视域下电影批评的四个维度》等。它就照着这个思路写了评论。文章的架子和我的论文很像。但我一看就乐了，看起来像模像样的，却是两回事。我自己绝不会那样写这篇影评。这下我的心踏实了。

甚至有时候用AI查资料，我们也得保持警惕，因为它经常出现“幻觉”。比如说，有些引文，我先用AI查一下。它就说某某人说过这样的话，在某本书的第几页。可是真去翻书，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话。等你反馈回去，AI会说，“对不起，我是根据其观点大致概括的”“对不起，我今后还要加强学习”。所以，我们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或者当老师的，不能只是依靠AI。它只能依托有限的语料库进行回答，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它的错误概率还是很高的。因此，我们可以参考它，不能全部相信它。

所以，一方面，技术代表了创新的可能性，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文艺天地。但是，在这新天地盖新的楼，建设人类精神的大厦，还得靠人自己。在这方面，技术永远代替不了人。所以，我们对此要有信心。我们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不能仅仅依托于AI技术，还要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说来，要让AI服从于人类情感的表达，服从于人的想象力、人的直觉与思想的引导。没有这些，人工智能创作出来的作品，表面上看上去再华丽，那只是低劣的炫技而已。所以，我觉得

用诗歌编织超越时空的纽带

(上接第1版)

“我喜欢这里的人表现感情的方式，以及那种没有猜忌的坦率。”阿根廷诗人巴勃罗·卡查季安说，此次中国之行前，他就决定要写一份旅行日记，于是挑了一本笔记本放进背包。笔记本上盖有一个印章，是在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时盖的，同时还有一句话，是导游在博物馆说的：“独角兽（獬豸）能用它的角分辨好人和坏人。”他想说的一切，似乎都在这句话里了。来到中国后，他还想到了庄子的逍遥和刘伶的任诞，想和他们一样成为一个随遇而安的人。“随遇而安并非意味着不做任何事情，而是多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是一种真诚对待自我的态度。”

巴拿马诗人哈维尔·阿尔瓦拉多说，19世纪中叶，一批中国人来到巴拿马，参与了跨洋铁路的建设。他们受到热带疾病的困扰，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巴拿马的华人社群每年都会向这些最早的跨洋通道建设者致以纪念。他曾为此写了不少诗作，为他们献上一份诚挚的祭奠。来到中国，他得以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特质。离开西安之前，一位中国朋友送给他一幅公鸡剪纸，这是他最喜爱的动物之一，“它将会在未来的清晨里不断鸣叫”。

从文字到生命，诗歌关涉着无比丰富的秘密

当诗人们聚在一起，“诗歌是什么”“诗歌有什么用”“诗歌面临怎样的新处境”等话题总会被谈起。不同的文化背景塑造了诗人们不同的诗歌观，当然更多时候是异中有同。在诗人们的深入交流和多维探讨中，诗歌的本相慢慢清晰起来。

“诗歌源自人类理解心理现象与情感冲突的渴望。”厄瓜多尔诗人埃内斯托·卡里翁认为，诗歌可能会从个人的历史出发，但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个人经验去追问一些根本性的命题。诗歌拒绝被局限住，它选择化身为一张“贪婪的网”。与此同时，诗歌创作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是无法被提前安排的。如果不允许那股无法控制的力量在内心扩散开来、自由穿行于潜意识的广阔世界，那么诗人写出的不过是贫乏的作品。他一般是在“飓风般混乱”的状态下进行写作，但“这股混乱总会被内心的音乐组织起来”，每一次写作都是对“我们是什么”以及“诗歌是什么”的探索。

哥伦比亚诗人亨利·亚历山大·戈麦斯说，当人类思考世界的起源、文明的起源时，神话就出现了。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神话，这些神话展现了初民的丰富想象力，伟大的文化、诗歌等也从中诞生。诗歌和神话一样，都

是对世界的命名。诗歌语言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它能不断地创造，让我们成为同类。在诗歌里，我们能够分享一种基于词语内在节奏的音乐性，仿佛能够回到原初的歌唱，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诗人的使命是守护神性之火，不断创造出新的美来。”萨尔瓦多诗人劳里·克里斯蒂娜·加西亚·杜埃尼亞斯说，这是她阅读萨尔瓦多文学名著《童年之后》后的感悟，书中写道，火蝶即使坠落火焰中也不会被灼伤，而每个成为诗人的女孩都会与这只火蝶相遇。这次中国之行进一步让她觉得，成为诗人的确是幸运的。诗歌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彼此的心灵靠得更近，“中国诗歌永存，拉美诗歌永存，愿这场精神共鸣永续。”

洪都拉斯诗人卡洛斯·奥多涅斯说，诗歌创作并非为了简单模仿现存的事物，而是为了建造我们缺失的东西。它赋予事物新意义，重塑新的现实。诗歌可以表达那些似乎无法言说但又不得不说的神秘思想与感受。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裂缝，从中可以看到现实的本质和历史的脉动。因此，诗歌创作又如发掘地下水源，这水源能够连接起所有的大陆。它不仅仅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让无法自我言说的事物发出声音，为所有文明的回响找到合适的传递途径。

“诗歌创作不仅是文字的书写，更是生命的体验。”墨西哥诗人马努埃尔·夸乌特勒说，诗歌可以抚平伤口，种下希望的种子。有时它还是一把锋利的刀，可以剖析世界，点明其中的矛盾。诗的语言凝结着情感与呐喊，诗人不是用墨水写诗，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写诗。随着新媒介时代的到来，年轻诗人们勇于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和节奏形式，让诗歌展现出新的风貌。但无论如何，诗歌创作始终要坚守自己的使命，那就是不断建构出新的审美境界。

从文学到友谊，期待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短短几天行程中，诗人们或围坐畅谈诗歌创作的感受，或交流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思想的碰撞与观点的交融从未停歇，彼此的心灵贴得更近。这份温暖的友谊和独特的情感，洋溢在每位诗人的微笑和发言中。

古巴诗人吉赛尔·露西亚·纳瓦罗说，中国和古巴有着长久的情谊，两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有深度交流。古都首都哈瓦那有一座中国城，在那里，她见到了很多非常友好的中国朋友。哈瓦那多次举办国际书展，这也是两国文学交流的重要平台。在诗歌领域，不少中国诗人的诗歌传入古巴，对古巴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很多古巴诗人的作品也被翻译到中国来，这有助于两国诗人加深对彼此诗歌文化的了解。“我们通过诗歌有了更加深入的心灵交流，感谢这场美好的相遇。”

“我们的语言、习俗和文化虽各不相同，却并未成为障碍，反而为创造更广阔的诗歌视野提供了条件。”巴西诗人雷南·奈尔伯格说，他使用的主要语言是葡萄牙语，但在此次活动中得到了其他西班牙语诗人的热情接纳，更得到了中国诗人和所有工作人员的热情接纳。中国古诗的音乐性与书法的美感令他着迷，希望有一天能再次回到中国，“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在我的国家接待大家”。

委内瑞拉诗人因迪拉·卡尔皮奥·奥利沃谈到，这次中国之行，她得到了很多中国朋友的帮助，特别是默默奉献的志愿者们，提供了诸多细节上的关心和支持。这也印证了她一贯的想法，涓涓细流，汇聚则成江河。正是这些微小的力量支撑起联结不同文明的桥梁，让诗意与友谊得以稳健传递。

“来到这样一个遥远而广袤的国度，我还在消化一切令人着迷的体验。”多米尼加诗人泰伊斯·埃斯派拉特·乌雷尼亚谈到，在中国，她看到了许多非常陌生的树，中国朋友告诉她好几种树名，由于没法准确发音，她已经忘记了这些名字，但始终对其中一种树印象深刻：树叶呈椭圆形，平展、细薄、碧绿，枝条的尽头是粉红色花瓣，有的还带一些斑点。她说，印象深刻但又无法命名，这也是参加此次诗会的感受。“我一直渴望来中国，现在能以这样的方式实现，真是美好。等我回到家，当我再想起这些树，当我知道它们的准确名字并分享出来时，其余的一切也会开始被命名。”

中国诗人张慧君谈到，德国作家歌德在19世纪初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世界文学”形成的过程中，翻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外国文学翻译大国，每年引进并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庞大。这些图书覆盖极其广泛的语种，中国当代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中外文学多重滋养的场域里。在我们的创作中，本土性与世界性紧密交织，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渗透的关系，这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回响。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诗意对话，在文明互鉴中印证了诗歌的力量——既是文明的回响，亦是未来的先声。中外诗人们以文字为舟，以心灵为桨，在交流中深化理解，在共鸣中缔结情谊，共同谱写了一曲中拉文明交融互鉴的动人乐章。这场国际青春诗会所编织的情感纽带，必将超越时空，持续激荡出新的诗意，更好助力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



文化原创力及其时代性

“原创”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它是从无到有的新的创造。具体到文艺领域，文化原创力源于文艺家在生活体验中获得新的艺术发现需要表达。文艺家要把新的艺术发现提炼出来，并为之找到合适的艺术形式。跟过去相比，这种文化原创力应当带有前所未有的、指向未来的新元素。它有助于人们开创有价值的新生活。当然，原创也不可能都是全新的东西。很多时候，它就是从已有的知识中组合出新的知识来。所以，原创不等于全部抛弃原来的，而是要从已有的东西中找到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哪些值得继承、哪些需要批判和抛弃。所谓“崭新的创造”，也往往是在批判继承传统的过程中才能确立起来的。

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原创，都跟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因为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时代背景。尤其在今天，在这个信息化时代、科技时代、AI时代，创作者面临着诸多的机遇和挑战。

回顾历史，人类文艺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离不开技术。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印刷技术、材料技术、媒介技术、传播技术，一浪高过一浪地发展着，并相应地引发文艺创作与传播产生新的变革。比如，从雕版印刷转向机械印刷，催生了报刊的涌现。这对作家的影响就很大。古代诗人、作家只能抄写或刻印自己的作品，手抄本和印刷本的数量以及传播速度都很有限。进入现代，《新青年》《语丝》等杂志纷纷创刊，作家们选择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而且，作家的作品集，比如鲁迅的《呐喊》《彷徨》等小说集，印刷更便利，传播也更迅速。再后来，电影电视得以发明，互联网出现并迅猛发展，持续重塑文艺新生态。

现在则迎来了人工智能技术，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它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便利。比如，有的人会把写报告、写总结等工作交给AI。甚至，写一个报纸专栏的开栏词，撰写一个分镜头的剧本，设计一个导演工作方案，创作一个宣传广告等等，AI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AI绘画、AI制作视频，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前不久，我还看过一个学校的AI绘画作品展。它学习了很多艺术家的画作，然后根据人类指令生成了丰富多彩的画作。人类要学习画画，那得费很大的功夫，而且还得看这个人是否有绘画天赋，可是AI一下子就“画”出来了，而且还比很多人都画得好。它所展现的空间、场景、形象，有些是人类想不出来的。不得不说，AI为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AI的挑战与原创力的保持

有些人说，AI时代来了，我们的文化原创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我们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第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用AI？或者说，我们能够完全逃避AI吗？

如前所述，AI已经在诸多方面介入了我们的生

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人类自身的力量。

努力铸就属于这个时代的文艺高峰

并不是人类技术发达了，我们的艺术就高明了。人类以往的文艺高峰，虽然成了过去时，但它具有马克思主义论述希腊艺术和史诗时说的那种“永久的魅力”。当然，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的文艺高峰。所以，我们今天要努力地铸就属于这个时代的文艺高峰。那就需要用好包括AI技术在内的所有的技术，使其服务于开拓人类精神新境界的目标。

对于AI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引导，强化其作用。我们对人类有信心，是因为：有一条，AI无论如何都做不到，那就是，人类需要不断面对新的生存挑战。在应对新挑战的过程中，人类会感受到困境，并且需要发挥自己的生命力、想象力、执行力去战胜它。AI不知道下一步人类会怎么样，人类自己都不能完全预想到，但面对新境遇，人类必然会激发起积极的应战能量。正是在这一点上，AI学得再好，也无法代替人类去面对生存困境的挑战。而新的艺术发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诞生的。

文艺的创作，就在对旧传统的批判继承中、在对新语境的积极回应中，涌现出新的原创力。因此，谈论原创力，可能还需要谈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黑格尔、批判费尔巴哈等已有的哲学家的思想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更有基于时代语境的创新。所以，今天我们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也要发扬批评精神，或者叫批判精神。只有保持批判精神，我们的文艺批评才能够真正发挥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作用。

具体来说，批判精神与文化原创力有什么关系呢？文化原创力，指向一种创造性元素或创造性力量。不批判，往往难以开展新的创造。只有在批判旧的、衰朽的东西的过程中，找到新的变革的方向，才能创造新的世界。任何一种新文化的出现，都带有创造性的元素，带有指向未来的新特征。这种新文化，需要在清理、辨析、鉴别已有东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已有的东西里有好有坏，有要坚持、继承的，也有要批判的、抛弃的。因此，批判精神或批评精神，是创造新文化、新文艺的过程必须要坚持的原则。

当前，我们正处于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时期。9月3日的盛大阅兵仪式，展示了我们国家的强劲实力，让我们每一个国人都增强了民族自信。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更加需要在不断提高高文化原创力、增强文化软实力上下功夫，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我们新的努力。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评协主席、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

作为一位现代经典作家，茅盾及其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推出的《茅盾十五讲》围绕茅盾的精神人格、其作品的多媒介传播、跨学科研究等维度，通过十五个专题精研，呈现了其作为知识分子、文学巨匠的立体形象。

《茅盾十五讲》选择从“作为个体的茅盾”视角出发，对茅盾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入探索与发掘。《性情与担当：茅盾的信仰之美》将茅盾置于整个现代中国历史语境当中，讨论了其如何与政治结缘、形成共产主义信仰，并分析了这种政治信仰如何参与了茅盾精神人格的形塑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样影响到他的创作活动。《茅盾的“枯岭情结”及文学呈现》则由宏观视角转向微观视角，对1927年牯岭事件进行了仔细探秘，通过茅盾当时写下的文字去剖析其真实内心活动，再现了历史现场，使得一个更加鲜活真实的茅盾得以显现。《茅盾批本：文本细读的意义》和《茅盾日记：“十七年”文学生态的隐性叙述》考察了茅盾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眉批本及日记。这些眉批展现了茅盾在特定政治与文化语境下对人道主义情怀与文学审美价值的坚守，为当代文学批评树立了标杆。以茅盾日记为密钥，穿透公共身份的表象，可以敏锐捕捉茅盾私人书写中信仰追求与政治担当之间的角力与平衡。茅盾的这种角力与平衡可以视为“十七年”场域中的特殊文学生态图景的一隅。文章对眉批与日记的史料运用，极大提升了研究的实证性与历史感。《茅盾译诗的症候式分析》和《旧体诗：茅盾晚年文化心态探幽》则令我们清晰地倾听到茅盾的诗路跫音。茅盾在“五四”时期的译诗活动主要是为了顺应时代需求，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茅盾晚年的旧体诗创作，体现了茅盾对艺术规律的坚守以及潜藏的精神人格。他在诗中化用骆宾王、王安石、辛弃疾的诗思作为自己的精神镜像，委婉地道出个人情感和精神景观。

茅盾的形象建构是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他的文学影响力不仅源于其作品的思想深度，更得益于多维度的传播机制。《茅盾十五讲》通过梳理报刊舆论、仪式传播、跨媒介改编与域外接受等路径，揭示了“茅盾”如何从个体作家被建构为现代文学的文化符号。《〈子夜〉出版前后的舆论研究》通过梳理1932至1933年相关报刊史料，展现了《子夜》出版前后的舆论生态；从销量追踪、广告文案到各类评论，呈现不同群体通过媒介参与作品意义生产的过程。跨媒介改编是茅盾作品传播的另一重要路径。《从小说到电影：〈春蚕〉的江南再现》与《电影〈林家铺子〉的诗意表达》分别探讨了《春蚕》和《林家铺子》的电影改编，揭示了文学文本向影像符号的转化逻辑。通过文学原著与电影改编在叙事策略、视觉美学、情感基调上的比较分析，深刻阐释了茅盾现实主义文本在不同艺术媒介中焕发的多元生命力。《茅盾在域外的传播》一文则系统梳理茅盾作品在世界多地的译介与研究轨迹，绘制了茅盾作品的传播地图。可以看出，传播中的茅盾始终处于“自我呈现”与“被建构”的张力中，茅盾的传播史本质上是不同时代审美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对话史。

《茅盾十五讲》还试图从新的视角对茅盾的重要作品进行阐释。《“农村三部曲”：革命的发生与启蒙的悬置》通过分析老通宝等农民的生存困境，揭示了农村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与历史必然性。《〈子夜〉的空间叙事》创造性地从物理空间、政治空间、叙事空间三个层面剖析了小说的结构艺术；吴公馆的封闭性象征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孤立无援，双桥镇的溃败暗示乡村经济的破产，上海都市的繁华与罪恶构成阶级博弈的场域。小说中的空间设置并非简单的场景铺陈，而是不同社会力量角力的隐喻。《从〈子夜〉看现代中国小说的经典机制》提出，经典的生命力在于“阐释弹性”。《子夜》既以社会科学方法构建史诗格局，又保留对人性复杂性的尊重，这种张力使其能持续回应不同时代的问题。

茅盾及其作品是永远说不完的。《茅盾十五讲》通过不断引入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试图呈现出一条完整清晰的由“文”至“人”再到“史”的茅盾研究脉络。这让我们得以更好地窥见茅盾精神世界的纵深感及其与时代关联的复杂性，更深刻地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文化贡献。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